

一 辛亥革命要革 什么人的命？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国内的封建专制势力从此一步步交织起来，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为了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繁荣昌盛起来，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但是到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加倍激化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发动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也不能避免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命运。时势的演进，迅速把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推到了政治运动的前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辛丑条约》

签订后，清朝统治者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充当了列强奴役中国的驯顺工具，因而清朝统治者也就成为这场革命的靶子，反帝反封建的意义集中反映在“革命排满”的活动中。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的建立者满族是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在明末迅速壮大起来，利用明王朝被推翻而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的有利时机，夺取并牢固掌握了中央政权。清初，满族的统治者抛弃了他们原来落后的奴隶制，承袭了明朝的封建制度。康熙、乾隆年间，出现了一个时期的盛世景象，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有效地抵御了外部的侵略势力。乾隆以后，清朝便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渐渐显露出衰败的迹象。它的吏治和军队一天天腐败下来，它的财政也逐渐感到紧张。农民由于生活条件恶化，掀起了大大小小的起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回民起义，均极大地撼动了清王朝。道光年间一位敏感的诗人龚自珍已觉察到了衰世的气氛，他预言“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意思是说社会底层的反抗运动，将如暴风骤雨般来临。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的时候，西方的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却在迅猛发

展。到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为止，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也逐渐进入高潮。工业生产的发展，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了繁荣，一方面也带来了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他们急欲占领、扩张殖民地，掠夺原料、财富，推销商品，转嫁危机。19 世纪前半期，他们的势力已扩张至中国的近邻，如印度、缅甸、阿富汗、新加坡等，富饶而又落后的中国成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1840～1842 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朝统治者与之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清朝统治者长期执行一条闭关锁国的政策，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他们毫无准备。开始时是蔑视，把新的侵略者等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夷”；经过战争的接触，才发觉自己不是对手。西方的入侵，不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也损害了清朝统治者的既得权益，因此，清朝统治者和侵略势力的勾结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抵抗到妥协，从妥协到有条件的合作，从有条件的合作到完全的投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

的入侵，每经历一次战争，不论清朝在战争中胜利还是失败，最后都签订了卖国的和约，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清朝统治者感到它受到了来自外部侵略者和国内人民反抗力量两方面的威胁，几经接触，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者发现列强对它的最高统治地位并不感兴趣，于是放心了，开始放手对付国内人民的反抗，甚至还借助列强的武力去屠杀国内的人民。

1860年咸丰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宠妃叶赫那拉氏（即以后的慈禧太后）通过一场宫廷政变，执掌了清朝的实权。她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淮系首领，开始执行一条“借师助剿”的政策，成为清朝对外政策的转折点。

新崛起的湘、淮系首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感受到中国正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发起了一场以“中体西用”为宗旨，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兴办了一些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场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是有些益处的，但它既不能改变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也不能真正富国强兵；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湘、淮军及北洋水师都未能抵御住日本的侵略。

甲午战败及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震醒了中国人民。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取得了年轻皇帝光绪的支持，于 1898 年发动了一场温和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他们的行动威胁到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后党的权益，慈禧于是扼杀了这场运动。康、梁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其他六人被砍了头，光绪也被囚禁在瀛台。

差不多与此同时，京城周围地区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天真地以为清朝统治者能和他们一起抵御外侮。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的势力打击了一下传闻要她“归政”的列强，但是不久她就翻过脸来会同列强剿杀了义和团。自此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列强的怀抱，慈禧太后对列强最终没有剥夺她的权位感激涕零，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说什么“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何等奴颜卑膝！

清朝统治者拒绝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改革政治的主张，放弃了与人民群众一起抵御外侮的机会，将自己置身于卖国与专制的漩涡中，因此，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崛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要革它的命了。

毛泽东说：“辛亥革命就是要革帝国主义

的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血与火铸成的剑指向清廷，实质上也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是清廷的主子，清朝廷是“洋人的朝廷”。

二 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形势

1. 帝国主义实施‘保全中国’的政策

帝国主义列强在订立了《辛丑条约》后，调整了它们的对华政策，不再叫嚣“瓜分中国”，而是抛出了一套“保全中国”的论调。1900年10月签订的（英德协定）中规定“不得利用现时之纷扰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其政策应以维持中国领土不使变更为指归”。在1902年签订的英日同盟条约中，也有与此相似的内容。这种“保全中国”的原则，逐渐得到了其他列强的认同。

从“瓜分”到“保全”，并不是帝国主义列强突发慈悲的结果，相反，他们是想花更小的代价来更大限度地奴役和掠夺中国。汹涌澎湃的义和团运动，让他们清楚地看到了蕴藏在

中国人民群众中的爱国热忱和反抗精神。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中国领土之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具备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巨大力量，使列强感到他们瓜分中国的计划，只是不切实际的痴梦。瓦德西说得很明白：“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与人民群众相反，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则心甘情愿地做了列强的奴才。列强表示不把慈禧列为应受惩办的祸首，不割占土地，使慈禧感激涕零，毫无保留地批准了《议和大纲》，并表示“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辛丑条约》是清朝统治者卖国媚敌的“巅峰之作”，清廷从此沦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既然有清政府这样一个驯顺的工具来执行他们的命令，乐得坐收实利，也不必去忙于瓜分中国了。

实际上，帝国主义列强抛弃瓜分中国的政策，还有来自他们内部的原因。经过 19 世纪末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各列强在华或大或小的谋得了一席之地，他们之间暂时达成了默契。若要继续瓜分，势必打破各列强间的利益平衡，从而导致他们之间的争夺，甚至要爆发战争，这种情况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即便如此，还是发生了争夺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1904~1905），以及英国为了抗衡俄国对西藏的控制，于 1903 年 1904 年发动了侵略西藏的军事行动，想在西藏地区分一杯羹。这两次战争结束后，至 1907 年，日法、日俄、英俄等协定陆续订立，所谓“保全中国”的政策，也就稳固下来。

在“保全中国”的幌子下，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有增无已。在 20 世纪的最初 10 年里，清王朝的朝政时常受到列强的摆布，而最严重的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几乎完全操纵于列强之手。

大规模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铁路修筑权，是列强输出“过剩”资本与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 1901 年至 1908 年，列强在华掀起了重新分割路权的斗争，如南满铁路的控制权从俄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京汉铁路的

投资原来由比利时出头，现在则改由英、法操办。同时根据已定的诸条约，列强继续修筑未完工或未开工的铁路，截至 1911 年，中国完工 9600 公里铁路，列强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其中的 93% 强。铁路本是一个国家推进近代化的主要手段之一，但中国在这一时期修筑的铁路，却成了列强手中最方便的工具，铁路延伸到哪里，他们的势力就扩张到哪里。

矿权的丧失，在这一时期也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列强以各种形式攫夺中国的矿权；一是援引德国在胶东谋取铁路附近矿权的先例，日本夺占了抚顺、烟台煤矿，俄国夺占了东清铁路沿线的几个煤矿等等。二是通过所谓合办的名义，来取得实际的支配权。由于清王朝财政匮乏，根本拿不出钱，合办也就成了列强独办，安徽、直隶和山西的部分矿权就是这样丧失的。三是直截了当地强迫清王朝出让矿权，如英国的福公司取得晋东南几个州县的采矿权，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取得滇东地区有色金属开采权，都是用的这种手段。

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几乎也被列强完全控制。1902 年，英国同清王朝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美、日也在次年与清王朝订立了类似的条约，这样就扩大了各列

强航运公司的特权。英、日、美、德、法等国都在华经营航运，其中尤以日本的日清轮船公司、英国的太古和怡和轮船公司实力雄厚，几乎控制了整个的长江航运，清政府自办的轮船招商局越来越无法与它们竞争，到 1911 年，招商局的船舶吨位大约仅占前述三家公司船舶吨位的 1/6。就全国范围而言，1907 年各通商口岸轮船总吨位中，外国轮船占有 84% 强的份额。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逐渐扩大；1900 年以后，增长速度也相当快，在纺织业、造船业、烟草业、机器采煤业等领域逐渐具备了垄断的实力。以造船业为例，1900 年英国资本的耶松船厂吞并了祥生、和丰两厂，垄断了当时上海的造船业。据经济史专家统计，外资厂矿在华谋取了平均高达 14% 强的利润，其中最高值竟接近 40%。

在投资工矿、运输业的同时，列强还以贷款形式，来谋取权益。高额的战争赔款，使本来已经很紧张的清王朝财政，更加举步维艰，只能靠借外债度过危机。这些外债的特点是多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而且利息高昂。通过这些借款，列强不仅控制了清王朝的财政，而且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1902 年以后，仅支

付借款本息一项，每年就高达 4000 万两白银。

帝国主义列强一方面“保全”清朝统治者，作为他们惟命是从的傀儡；一方面用“温和”的经济掠夺方式，来谋取在华的最大权益。他们以为靠这一套把戏能瞒过中国人民的耳目，从而避免遭受激烈的反抗。事实上，这只是他们的梦想，一种全新的革命力量已经逐渐积聚起来了。

2. 清政府以“新政”谋求自存

在帝国主义列强调整对华政策的时候，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也酝酿起变法事宜来。1901 年 1 月，流亡在西安的朝廷颁发了一纸上谕，显示了慈禧的变法决心。上谕中说：“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把变法提到了系乎存亡的高度。上谕还要求朝中百官、地方督抚及驻外使节就变法一事各抒己见，限期在两个月内提出意见，以便朝廷采择。4 月 21 日，又成立了督办政务处，由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等负责，全盘筹划新政事宜。慈禧离开西安返回北京的前夕，又一次发布文告，强调变法自强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命脉，重申朝廷变法立意坚定，志在

必行。

朝廷唱起的变法调子，得到了几位重要督抚的回应。直隶总督袁世凯揣摩准了慈禧的心思，于 1901 年 5 月率先上了个奏折，陈述了 10 条有关变法的意见，涉及改革军备、财政、开通民智、派遣留学生等方面。同年 7、8 月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个奏折，系统地阐述他们对变法的见解，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张、刘二人认为变法的第一步要从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材做起，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广设新式文武学堂、奖励留学。他们列举了需要整顿的中法十二端，需要采用的西法十一端，主要包括裁汰旧军、编练新军、鼓励工商业、改革币制、派员出国考察、改造旧律等方面。他们的主张，很符合慈禧的心意，她表示要按照这几位督抚的条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清王朝上上下下如此热心举办新政，多少有些异乎寻常。只在两年前，慈禧太后扼杀了维新运动，如今却重弹变法的老调，是什么力量促使她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一方面也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某种松动。无论在民间，

还是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都有一部分人逐渐明白了学习西方、改革旧制度的重要性，这部分人的力量从小到大，其政治影响也愈来愈大。在清廷内部，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就有洋务派和顽固派之分。慈禧太后在两派力量之间搞平衡，对于洋务派的活动，只要不超出“中体西用”的范围，她还是允许的。中日甲午战后的严重民族危机，唤醒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参政意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兴起了维新运动。对于维新本身，慈禧太后并无多少恶感，只是光绪想借运动来谋取实权，于是维新成了帝党和后党权力之争的牺牲品，慈禧为了维护她的最高统治权，不惜把维新与帝党一同打倒了。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本来已经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更加虚弱了，来自下层的反抗一天胜过一天，社会的中层对清廷也逐渐显得失去了信心。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动不动就提到所谓“伏莽遍地”，意指各地潜伏着起义的危机。显然，按照旧的方式已无法统治下去了，于是慈禧太后带头画起了变法的救命符。

变法的目的之一，是要博取列强的欢心和信任。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列强点名杀了一

批著名的顽固派官员，而对义和团运动期间组织东南互保的洋务派督抚表示了赏识与信任，自此后，顽固派的势力一蹶不振，慈禧太后也不再在两派间搞平衡了，而单独倚重洋务派官僚，于是洋务派的那一套自然而然也就成了她的施政方针，与列强的关系也就更近了一些。帝国主义列强感到清朝的统治并不稳固，为了不让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垮台，他们也鼓动清廷着手改革。控制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人赫德向清廷提交了一份《更新节略》，为清王朝的变法设计了一套方案。清廷向列强表示实行新法，就是为了日后报答各大国的恩惠。

变法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消弭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找到支持与信任，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与信任。同时，通过变法增强实力，藉以对付日益蓬勃的革命风潮。

从 1901 年至 1905 年，清廷颁布了不少关于推行“新政”的上谕，涉及面很广，但最核心的内容不外三个方面。

一是改革军制，裁汰旧军，编练新军。从 1901 年起，清廷屡次严令地方督抚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组建新式陆军。1903 年 12 月，清廷成立了练兵处，由奕劻、袁世凯、铁良三人负责，主持全国的新军编练工作；在各省也

设立了督练公所，负责该省的新军编练。清朝新军的开始编练，是在甲午战后天津附近的小站练兵，后来由袁世凯主持小站的练兵工作，北洋新建陆军由此发端。同一年，张之洞在暂署两江总督期间，聘德人为教官编练自强军，张之洞回到湖广总督任上时，带了部分自强军回鄂，成为湖北新军的基础。新军的新，有三点，一是装备西式武器、按西法编制、按西法操练；二是新军的兵员要求高，规定年龄从 16 岁至 22 岁不等，身高四尺八寸以上，南方人酌减二寸，体质弱、有目疾暗疾的不收，有不良嗜好的、有犯罪纪录的不收，而且对兵员的识字程度也有规定；三是新军的军官由毕业于军事学校的人担任。清廷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设立了不少武备、陆军学堂，并分批派遣青年出国学习军事。

1906 年 11 月，清廷将兵部改为陆军部，并把练兵处并入，由铁良任尚书。次年 8 月，制定了全国编练陆军 36 镇（相当于师）的计划，而实际上由于财政匮乏、人材不足，至清朝灭亡前夕，仅编练成 14 个镇、18 个协（相当于旅）、4 个标（相当于团），外加一支禁卫军，共约 16 万人，其中以北洋六镇实力最强。

清廷编练新军的目的，是想靠新军来支撑

其统治，但新军却朝统治者所希望的相反方向演变，很大一部分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后来成为革命的力量。

二是鼓励私人资本兴办工商业。1903年9月，清廷设立商部，由曾赴欧美和日本考察过的载振（奕劻之子）任尚书。这个部的权力很大，工矿业和铁路都由它管辖（1906年改称农工商部）。商部成立后，陆续制定了一批商律和奖励实业的办法，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实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清廷鼓励私人资本开办工商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但这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让步已经太迟了，此时外国资本已然在华形成垄断之势，民族资本无法与之竞争。而且清廷并没有交给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实权，只不过按照投资者投资实业份额的大小，赏与不同的官衔罢了，并没有一条切实保护民族资本的措施。

三是改革教育，逐步废除科举制度，着手培养新式人材。清朝沿袭前朝的科举制，把知识分子囿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时值近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举制是造成中国落后的祸源之一，要求废科举，兴新学。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设立了一批专门性质的学校，以培养洋